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

——对谈纽约州立大学撒万土教授

郇庆治 赵睿夫/文

[摘要] 文章就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意涵与理念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图景、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评估、后危机时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前景、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关键词] 生态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环境政治

[编者按] 撒万土·恩格尔-迪莫罗 (Salvatore Engel-Di Mauro),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地理与环境研究系教授, 曾任生态马克思主义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主编, 现任该期刊高级编辑,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 杂志编审。代表作有《社会主义国家与环境: 对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的启示》《生态社会主义的城市食品生产》等。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土壤污染治理、城市食品生产等, 近年来尤其关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与成就。他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研究的新著《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性介绍》即将由帕尔格雷夫出版社出版。

2024年6月10日至28日, 应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邀请, 国际知名生态

社会主义研究学者撒万土教授到北京大学等高校和多地进行学术交流。其间, 撒万土教授与郇庆治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专题对谈。

郇庆治: 撒万土教授, 非常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邀请, 来到北京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对于我的研究团队而言, 您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成果是十分重要的。接下来, 我想按照我们此前商定的方式做一个专题对谈: 首先, 我将简要介绍我们研究团队的方法论共识以及较为关注的理论议题, 然后, 请您对这些议题做出回应。在这个过程中, 您当然可以阐述更具体的议题、观点、著作或案例, 我们会就您的阐述进行对话或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此外, 本次对谈交流将由赵睿夫博士负责记录与整理。

撒万土: 这样安排非常好。在您开始阐述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媒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究”(2022JZDZ011)的阶段性成果。

之前,我想首先表达我的敬意与谢意。在过去一段时间,您与您的研究团队已经在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您编辑的英文著作《作为政治的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 as Politics*)等至今仍是我开展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它们为我们了解中国学者的理论观点提供了帮助。非常荣幸能再次来到中国,我对我们即将开展的对谈充满期待。

郇庆治:相信这次中国之行会对您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帮助。为了更好地取得共识,我将首先说明我们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探讨对象的基本认知:它是一个率先在欧美国家兴起的、颇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影响的、依据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影响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展开政治理论分析的新型社会主义思潮或环境政治理论流派。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我与我的研究团队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基于一个“深绿—红绿—浅绿”的三维分析认知框架,而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红—绿”“激进—保守”等的二分法。也就是说,生态社会主义可以、也需要被定位为更宽泛意义上的“红绿”理论的核心性构成内容,并不断以此发挥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阐发与传播、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及其反生态性的揭露与批判、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图景的构想设计与过渡筹划等重要理论功能。

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我期待在本次对谈中能了解您对至少如下三个问题的看法:其一,如何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表征、发展历程以及现实境遇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与研究;其二,作为长期从事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您如何理解与评价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三,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与未来走向,应当做何种判断或展望。当然,也欢迎您进行任何有必要的理论援引或阐发,这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概念意涵与理念原则

撒万土:首先,我对于您带领团队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完全认同,借助“深绿—红绿—浅绿”认知框架,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规范化,这有助于避免将生态社会主义混同于生态现代化或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并不是、也不应当是完全哲学化的。回到我们对谈的主题,为了回答您的上述三个问题,我想先对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认识加以阐述,至少需要对生态社会主义早期思潮的理论基础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从总体上看,生态社会主义者通常与1960年代以来的几种主要思想或思潮关系密切,或者说,它们可以被视作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及其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时期”社会主义/*“first epoch” socialism*),以及各界人士对其进行的评价、讨论;二是欧美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与激进思潮,比如环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三是“新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观点与政治实践;四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等各类学术流派创建的对资本主义进行诊断、揭露与批判的社会政治理论;五是工团主义与原住民本土生态文化传统,等等。在这些“前史”的理论滋养以及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现实之下,生态社会主义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可被讨论的对象。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它也受到了如下重要思想或思潮的显著影响:“(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资本主义(“浅绿”)批判理论、“物质变换(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等。这些明显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影响的理论流派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十分关键,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

论内容。

要理解生态社会主义,就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与迈克尔·罗伊(Michael Löwy)的研究工作启发了我。科威尔在2005年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基础》中将生态社会主义界定为“基于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ecologically rational socialism),这种定义方式凸显了生态社会主义在观念维度上的重要表征。罗伊则在2005年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without productivism),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去生产主义改造的结果,这种定义方式凸显了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基础上的主要依托。概念理解的多视角会引起对概念定位认知的差异,因而,生态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愿景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抑或二者本就是同一现实状态的不同形式的表述,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上述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的讨论已能够体现出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多样化特征——尽管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在语词的意义上“共用”这一术语作为其理论主张或政治口号,但事实是,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稳定而坚固的理论共识还远未确立。就此而言,您所提出的对于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与分析框架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也想借鉴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看法。

郇庆治:对核心概念的理解以及近似概念的表意进行辨析,始终是“红绿”理论研究的一个困难环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与我的团队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左翼等基础性概念进行了考察分析。在更具体的意义上,我们所谈论的生态社会主义概念也会依据特定的立场与视角而被称为社会主义生态学(socialist ecology)、绿党(绿色)社会主义(green socialism)、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democratic eco-socialism)等,而这些概念的

存在本身就反映了您刚才提到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缺乏共识的问题。鉴于研究的科学性与全面性,我们尝试用各种方式来对这些概念及其背后的理论思潮进行整合,比如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态学或政治生态学等伞形概念及研究视角之下。目前,我们取得较大进展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这一伞形概念整合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绿色左翼理论等理论流派,并且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五卷本)。我相信,这至少是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创造更可靠平台的一种努力。

在刚才的阐述中,您谈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起源与一般概念,尽管关于这一概念的共识性认知还有待实现,但我们已经能够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加以讨论和概述。换言之,我们已经能够概括出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认同或力主践行的理念。对此,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要点:其一,生态社会主义普遍遵循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逻辑的原则,这是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绿色)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其二,生态社会主义普遍追求社会公正与基层民主的目标,这是其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的体现;其三,生态社会主义普遍偏向于构建自主自立自足的经济架构,而且虽然不否定国家的积极作用,但仍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有着明显区别;其四,生态社会主义始终信奉并追求生态可持续性。我会很自然地将这些生态社会主义理念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相对照,我们可以在稍后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而现在,我们仍需要集中于生态社会主义本身,尤其是它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现状做更为具体的描述。

撒万土: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来说,这种对更高概念共识的追求当然有着更特殊的意义。在这次访问中,我同赵睿夫多次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这个伞形概念,在我看来,这

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尝试,它将使得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再只被简单地视为某种文本学派,而会促使我们更多关注与发掘它们所蕴含的政治学理论内涵与社会主义实践潜能。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与自主话语表达能够得到更为积极的呈现,因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十分强调表现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主体性。

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我非常认同您的概括,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已经非常清晰与全面。作为补充,我想简要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个人看法。首先,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理念无疑是质疑资本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应对方案,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也坚信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终极原因。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必然信奉和恪守生态原则,即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普遍共识。再次,生态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试图对所谓的“第一时期”社会主义进行修补与完善。最后,生态社会主义者通常追求通过建立对生活资料的社会控制实现社会平等,而这种平等显著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平等社区等形式。当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些普遍的理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生态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均质性,在对分权主义抑或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传统技术抑或替代性技术的技术形式等问题的认识上,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尽管如此,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值得反思与批判的问题是,部分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度质疑现行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方案更广泛地存在于发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环境政治或绿色议题领域西方叙事(western narratives)的霸权性影响的表现之一,并将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联合与合作构成挑战。无论如何,生态社会主义仍面临着过度分散化的问

题,您所强调的四个方面的原则将有利于消除分歧、创造更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

二、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成就

郇庆治: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研究方法。对一种统摄性学术概念的使用,同时意味着对研究方法的选取或设计,就如同我们积极倡导的“深绿—红绿—浅绿”三维分析框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等一样。我们注意到,您时常使用“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a geography of ecosocialism)等概念,这似乎构成了您从事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依托。在过去的数次交流中,我注意到,您对于这一概念与方法的使用同通常意义上的“地理学”存在区别。在我看来,您所言的“地理学”在更大意义上接近于“图绘”或“全景”,而不是从一种学科视角出发理解与使用“地理学”的概念与方法。您能否更详细地阐述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或社会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发您对生态社会主义演进历程的具体认识?

撒万土:地理学是关于不同事物的时空分布的学理性研究,但也有学者强调,地理学是一门关于不同人物、空间、关系的知识场地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我所采用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确与您所言的“图绘”或“全景”颇为类似。事实上,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环境治理经验的分析,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地理学研究,我称其为“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这一研究想要呈现的是,在世界各地(并不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孕育、产生、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或与生态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理论、运动与组织的历程和动向。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总是存在着非均质性或内部的不统一性,因而,在不同时空条件

下进行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的整理与归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依照这一研究方法,我所谈论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那时,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为代表的英国工党成员已经形成了被称作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在相近时期的澳大利亚,基于工会主义与环保主义结合的早期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也在阿兰·罗伯茨(Alan Roberts)、尼克·奥利格拉斯(Nick Origlass)等人的推动下出现。此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发生在欧洲、美洲以及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区或国家,尽管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这些生态社会主义人士或组织普遍游走在绿党、左翼反资本主义政党与工党的边缘,但很少在某个大型政党内部形成主导性力量。欧洲的生态社会主义通常以党内团体、思潮或网络的形式存在,比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内部的绿色左翼(the Green Left)、英国的绿色社会主义联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等。事实上,欧洲只有极少数对生态社会主义纲领持支持态度的政党——比如荷兰绿色左翼党(GroenLinks)——能够在议会政治中获得较大影响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或组织较为弱势,比如冰岛绿色左翼(Vinstri Græn)、葡萄牙左翼集团(Bloco de Esquerda)等,仍很难表现出更强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

与欧洲类似,北美洲的生态社会主义也较为弱小,在美国、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通常只以局部的党内思潮或城市办公室的形式存在,尚未组织起有影响力的政党或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相比之下,采取了一些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的格陵兰岛反对党因纽特人党(Inuit Ataqatigiit)在2021年的提前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1/3的选票并赢得了选举,这对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已经是较大的胜利。在中美洲,墨西

哥的劳工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as y los Trabajadores)与社会主义革命协调社(Coordinadora Socialista Revolucionari)都支持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在南美洲,巴西曾涌现出齐科·门德斯(Chico Mendes)、“森林人民联盟”(Forest Peoples Alliance)等与生态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政治人物或组织,但政治分化也在不断发生(比如玛丽娜·席尔瓦从生态社会主义向主流政治观点的转向);直至2011年后,社会主义与自由党(Socialism and Liberty Party)才整合成为在当地能够获得一些议会席位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南美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中,许多受第四国际影响的政治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巴西的社会自由党(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阿根廷的工人社会主义运动(Movimiento Socialista de los Trabajadores)等。总之,第四国际及托洛茨基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联值得进一步考察。

此外,菲律宾、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生态社会主义进展也足以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北拉瑙,棉兰老革命工人党(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 - Mindanao)于2001年脱离新共产党(New Communist Party),并于2003年作为第四国际的成员奉行生态社会主义理念。自1990年代以来,南非的生态社会主义以社会运动形式存在,对种族隔离政权造成的种族主义和环境退化进行批判,共同促成了南非生态社会主义的运动化,直至2023年社会主义扎拉巴扎(Zalabaza for Socialism)成立,南非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尽管其影响仍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正如刚才介绍的,澳大利亚的生态社会主义兴起很早,到2010年,这些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被整合并入成立于2001年的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由此,澳大利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拥有了一些市政和地区办事处。

一个较为特殊以至于需要单独介绍的国家是委内瑞拉。迄今为止,委内瑞拉所发展的玻利瓦尔生态社会主义(Bolivarian Ecosocialism)展现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最大、最制度化的影响。在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政府的推动下,生态社会主义成为该国“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础,并被用于指导委内瑞拉的国家生态社会主义(state ecosocialism)与社区运动(the comunas movement)实践。概言之,它取得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成就:建立社区委员会;颁布2008年《综合农业卫生法》(Law fo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Health);将生态社会主义原则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颁布《卡梅罗山宣言》(Mount Carmelo Declaration)与《种子法》(Seed Law);在2015年宣布成立政府生态社会主义部(Ecosocialist Ministry),等等。委内瑞拉的案例充分展示了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潜能,但这些建设与发展经验似乎很难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模仿借鉴。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呈现出如下表征:首先,组织结构上主要以松散、边缘的政治网络与运动形式存在,鲜有政策影响力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这与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忽视国家机器的重要性且过度重视基层的社区和运动有关。其次,除委内瑞拉取得的成就较为明显外,绝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与运动的寿命都非常短暂,很难说产生了持续性、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影响。委内瑞拉的案例表明,武装力量的政治立场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持续存在有着重要影响。再次,出于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误解与轻视,生态社会主义普遍更容易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与发展。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潜能是,它们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外部支持力量,因为它们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社会主义传播效应,尽管这方面的潜能仍面临着挑战。

郇庆治:借助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您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以及现状的评述翔实而系统。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很重视对最近10年拉美红绿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南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进展的研究,也安排了团队成员持续跟进,但目前来看这些运动的效果尚不理想。对于现状,我的直观判断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弱小而边缘,几乎无法从中产生主流的社会政治组织,生态社会主义者很难进入全国性的政府和议会。因此,从总体上看,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需要取得现实成效的社会政治运动是比较让人失望的。当然,尽管生态社会主义的进展尚不能够支撑起对其积极乐观的未来展望,但正如您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潜能,这种外部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同样具有意义。

在上述关于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的讨论之后,我想把话题转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及其启示。前者有利于促进中国学者审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后者则能够使我们中国学者更好地理解国外学者看待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环境治理的总体态度。在这方面,您在2021年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国家与环境:对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的启示》。在这部著作中,您强调重新评估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实践和政策及其经验成就、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贡献远大于其破坏性影响的必要性,并指出不应否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而应该将之作为对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的启示加以借鉴吸收。我认为,这部著作至少反映了您基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些基本看法。与此同时,该著作对于中国环境治理的评述发人深思,这可能会成为我们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前景的切入点。

撒万土:感谢您对《社会主义国家与环境》

一书的关注,这部著作凝结了我对此议题的阶段思考。当然,就学术研究的动态性而言,其中很可能存在一些如今看来不够成熟的观点。因此,今天的对谈也算是一次让我澄清认识的机会。该书试图阐发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具生态可持续性的国家形式。对于这一论点的论证,我将之概括为至少如下四个层面:其一,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更强的生态敏锐性。自1917年以来,生态环境保护一直是苏联以及此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事项,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十分重视执政党内外具有生态意识的理论。其二,即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压力以及由其制造的环境治理压力(包括军事威胁所带来的军工产业污染等)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也并未在实证维度上表现出过度负面的环境治理效能。其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成就通常并不来自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污染转嫁或资源剥削,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成就通常能产生某种程度的积极的国际影响,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就是中国。其四,从更长时间周期的环境治理效能来看,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会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国家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更高的环境友好性,这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以及其社会主义政治原则有关。

更具体地说,当前,我们可以直观把握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成就至少体现在生态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净成果、集体消费(如公共交通)的建设优先级、绿地融入城市规划、人均废弃物量较低、集中发展前沿环境监测机制、牵头主要国际环境条约等方面。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建树是显著的,这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优势,即便一些所谓的“生态主义者”并不能够正视这些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就不存在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总是面对着来自

资本主义世界的各方面压力,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以及污染能耗转移的压力。当然,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制度也处在不断地优化调整中。总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环境退化是可以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分析框架意义重大。

三、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

郇庆治:我很感谢您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就的肯定与传播,这本身就构成了当代世界“红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我也相信,这与生态社会主义及其研究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接下来,我想我们需要讨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其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关系问题。

可以确信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然是生态进步性的,而作为一种话语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本身并不激进,这无疑与领导人及相关工作者能够更为积极地重视、理解与使用生态实践辩证法密切相关。这方面的一个突出实例是如何处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对于如何找到让资本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机制,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概言之,无论是从政府还是社会的视角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愿景正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贫困所导致的环境与生态相互冲突的问题,但仍面临着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社会公正等问题。这是我们当下工作的着力点。

现在,我向您提出的问题是:第一,您多次说过,您对于中国的认识一直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那么,尤其是经历这次考察旅行之后,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成就?第二,我们是否有可能,或者如果有可能的话,如何将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纳入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研究之中?第三,基于时代的发展与国际局势变化,您如何看待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

撒万土:这是几个非常好的问题,十分感谢。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扭转了几十年来特别是现代化初期发生的生态环境破坏,开展了生态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实践。在国际层面,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建设生态文明对全人类和改善全球社会环境的前景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显然扮演了最为重要的领导角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7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基础设施、人民物质生活质量以及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视与探索,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各项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与人口平均寿命、绝对贫困率等数据的变化来证实这一点。这个过程还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在我看来,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发生逻辑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对人民负责,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因而能够发动各方面社会力量实现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当然,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贯彻落实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外部评价而言,尽管国际社会还存在着一些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轻视或误解,但这些成就的客观实在性已经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包括亲资本主义的罗马俱乐部等组织都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而类似的成就并未在罗马俱乐部等组织所支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从我这次来中国的实地考

察来看,中国的空气污染已大幅度改善,过度开采的采石场正在得到修复,植树造林和草原管理工作取得很大进步,沙漠扩张现象得到遏制甚至被逆转。事实上,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和使用的世界领导者,这些优势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继续取得更大成就的关键。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比如碳排放总量的降减问题、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适当关系问题等。客观地说,这些问题是难以彻底避免的,因为中国仍需要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以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秩序的压制,这是长周期的历史性任务。完全可以说,世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关系紧密。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难以轻易下结论的问题。从您的阐述中,我能够理解您的观点,即通过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角转换,把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成就纳入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研究的范式之中,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尤其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未显现出足够成就的情况下。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任何类型的“红绿”议题研究所不可忽视的对象,尤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忽视或误读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成就将可能导致生态社会主义自身的进一步弱化,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是全球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值得关注与讨论的具有领导力的生态力量。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我在这次学术旅行中曾与赵睿夫多次探讨。我们基本同意,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世界各地的生态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所导致的,比如理论建构者与研究者知识文化基础的差异、生态社会建设的目标愿景的差异、

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环境与条件的差异、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对理论与实践影响程度的差异、领导者与执行者的综合影响力的差异等。因而,不太容易、也没有必要直接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主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本身,尤其在后者相对薄弱而前者的发展已经成果丰硕的情况下。很显然,您所说的对于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及其研究的广义化理解,是对上述事实充分认知的结果。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将有助于生态社会主义寻求新的增长点(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同时也能使世界各国更好地认识、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成就与优势。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倾向于以宏观的方式来回答,因为生态社会主义及其研究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很难达成完全的共识,这也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尽管生态社会主义的称谓被普遍使用,但其关于国家的作用、政治战略和组织形式等问题的多元认知造成了分散化的局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非法性不断暴露,疫情与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持续增加,使得生态危机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共鸣。特别是,资本主义统治下日益极端化的财富不平等与日趋极端化的环境问题的结合,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被更广泛地接受带来了巨大潜能。与此同时,对于疫情应对成效以及战争议题立场的差异化理解,也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挑战。因此,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达成聚合的难度将远大于走向分散化。基于这些认识,我对生态社会主义未来前景的大致判断是:生态社会主义的近期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黯淡的,但如果所有派别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改变目前的政治战略和组织形式,逐步超越中央集权一分权的分歧,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在那之后,国际上

有可能会有一些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组织的机会,这些组织可以发展成为具有重要性和影响力的社会政治组织,从而能够产生更为具体而持久的影响。很显然,这仍将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而且正如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中国理应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与关键的推动者角色。■

[邰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赵睿夫: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袁倩)